

论李梴《医学入门》“脏腑论”

翟双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 北京 100029)

关键词: 李梴; 医学入门; 脏腑论

中图分类号: R 223.1

李梴,字健斋,明代江西南丰人,具体生卒年不详,约生于明嘉靖年间即十六世纪,是一代知名的儒医。曾编撰《医学入门》(刊于明万历三年,即1575年)一书,该书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将多种古人著作重新合并分类,提取其精华而成;二是以《医经小学》为主要蓝本,用歌赋形式写作。《医学入门》的许多正文是用歌赋形式写作,但又以大量注文作补充说明,不仅汇集了各家学说,而且也阐明了作者自己独特的见解。“脏腑”一节分“总论”与“条分”两部分,前者汇集了脏腑功能、主病、数目等各家看法,并进行了分析;后者则对各脏腑的功能、解剖、病变、用药、养生注意点进行了说明。今仅对其特色与不足做一简要剖析。

1 “脏腑”一节的贡献与特色

“脏腑”一节分“总论”与“条分”两部分,系统地论述了脏腑的功能、常见病证及治法,条目分明,较有层次,可谓为中医学脏腑理论系统化做出了贡献,基本上达到了使人学医“入门”之目的。每一脏腑之下均据前人之论述与经验详列其虚实寒热病证,并列出的治疗药物,使人读来有物,临证则可有的放矢。就其学术观点而论在以下几方面又有真知灼见之处。

1.1 提出解剖之心与神明之心有别

“脏腑”云:“心者,一身之主,君主之官。有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气血所化,生之本也,万物由之盛长,不著色象,谓有何有?谓无复存,主宰万事万物,虚灵不昧者是也。”将解剖之心与主神明之心明确分开,是李梴的一大贡献。

古人认识脏腑,其初始本意是指脏腑为实体脏器。《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均记载了用五脏祭祀的活动,其所谈虽是用牲畜之脏腑,但所言五脏之

肝、心、脾、肺、肾等均是指实体脏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中医学经典著作《内经》与《难经》也记载了大量有关脏腑的内容,其中许多是对脏腑位置、大小、形态的描述。但由于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解剖术较粗疏,还缺乏从微观探讨人体脏腑组织的手段,而为了解释、解决人体发生的众多病变,适应医学的发展,古代医家便从能用肉眼直接观察到的人体外在表现及功能活动上(即“表象”)入手,运用当时的哲学思想如精气学说、阴阳五行、易象思维等,去探讨人体。这些实际上正是古人从实体脏腑转而建立藏象系统(非实体脏器)的内、外部原因,正如范文澜《中国通史》所云:“战国医学家知道从解剖求病理,确是找到发展医学的道路,不过,当时的解剖术很粗疏,要说明病理,不得不采取阴阳五行说。”即脏腑概念由实体转向了非实体,其中心的概念也从解剖实体转换为人之神明这一非实体,用心指代人的精神意识活动。但是古人并未完全自觉地意识到这种转变,因而还常用解剖之实体心脏指代人之神明。如《列子·卷五·汤问第五》云:“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治之,既同愈。谓公扈齐婴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脏腑者,固药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与体偕长,今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愿先闻其验。’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于是公扈反齐婴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识;齐婴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弗识。二室因相与讼,求辨于扁鹊。扁鹊辨其由,讼乃已。”这虽然是一个传说故事,但可以看到古人把肉体心脏同人的精神意识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用肉体之心指代主神明之功。其后南宋道家余洞真

《悟玄篇·玄关一窍》云：“玄关一窍者，乃一身总要之关也，此窍者即心中之心是也。其心非肉心，乃心中之主宰，一身万事之神也。”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王文成公书·卷三·传习录下》亦云：“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均将主神明之心与肉体之心作了区分。李梴作为医学家，从医学角度认识到了解剖之心与神明之心的区别，其论与之相合，故可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贡献。

1.2 继承《难经》左肾右命门说并有发挥

命门，始见于《灵枢·根结》：“命门者，目也。”其后《难经·三十九难》则提出“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创立了中医学的命门学说。“左肾右命门”之说对后世具有相当的影响，但到了明代，许多医家并不赞同其说，唯有薛己（1486年—1558年）及李梴等继承《难经》之论，其中李梴《医学入门》刊于1575年，又在薛己之后，对命门的部位及功能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脏腑”言：“命门下寄肾右，而丝系曲透膀胱之间，上为心包，而膈膜横连脂漫之外。配左肾以藏真精，男女阴阳攸分，相君火以系元气，疾病死生是赖。”认为命门寄于右肾，与膀胱、子宫相连，具有藏精、受胎主生殖之功能；并进一步发挥云“心包即命门，其经手厥阴，其腑三焦，其脏心包络，其部分在心下横膈膜之上”，认为命门也包括了古人所称的“心包络”之功能，故而在论述命门病证时，也将原属心包经的病变纳入其中；还认为命门为相火之脏，主持人体元气，因此为医家诊治的重点，故其云“凡病虽危，命脉有神者生，命脉无神者死。”若此，命门虽寄于右肾，但与左肾为配成之官，上至于心，下至于膀胱、子宫，为相火之脏，具有主持人体元气、藏精、主生殖之功。这一认识不仅继承了《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而且有了较多发挥，赋予了命门以新的含义，在明代医家虞抟（1438—1517年）、孙一奎（1522—1619年）、张介宾（1563—1640年）、赵献可（1573—1644年）等将命门指为居于肾间、命门为肾间动气、为君火等诸说之中，也可谓独树一帜，丰富了肾命学说的内容。

1.3 心包络新论

“脏腑”在排列脏腑时未列心包络而是列了命门，在“命门”条下提出：“心包即命门，其经手厥阴，其腑三焦，其脏心包络，其部分在心下横膈膜之上。竖斜膈膜之下，与横膜相粘。其处黄脂漫包者，心也。其漫脂之外有细筋膜如丝，与心肺相连者，此胞

络也。”在命门病证中云：“风则肘臂挛急，腋下肿红；气则胸膈支结，胁不舒太”、“血衰面黄，而心下崩且烦”，李梴在注中解释云“心包支脉循胸，出胁，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膈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心包脉起于胸中下膈，循历络三焦，故病有胸病及息责者”，“盖悲哀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包络绝而阳气内鼓动，发则心下崩数洩血也”。很显然，认为心包络就是命门。

心包络《内经》称其为十二脏腑之一，作为脏腑而言，其功能仅起代心行令、代心受邪、保护心的作用，正如《灵枢·邪客》所云“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素问·刺法论》所言“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可刺心包络所流”。除此并无其他特殊功能。因此中医学家在论述各脏腑功能时，大多把它放入心中讨论，认为它只是心的一个附属器官。而由于经脉学说的需要，一条经脉要配属一个脏腑，正如《灵枢·海论》所云“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同时也为了满足经脉表里相配、脏腑相合的关系，心包络又被列为脏之一，经脉为手厥阴而与手少阳三焦相合，也解决了三焦为“孤腑”的问题。这种理论在中医学界已得到公认。而李梴则将心包络指为命门，故可以说这是一种创新观点，既丰富了命门学说内容，又解决了心包络称为脏却与其他五脏重要程度不能平列等诸多问题。但李梴的这一观点也仅是各家学说中的一种，并未得到中医学术界的认可，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4 三焦亦一焦，与命门相配

李梴认为三焦有名无形，无形而有用，其功能主气主食主便，发无根之相火而游行诸经，具有升中清、降下浊、养精神、柔筋骨之功，力主三焦为上、中、下三焦，包容十二脏腑以至全身之说，故其云“观三焦妙用，而知脏腑异而同，同而异，分之则为十二，合之则为三焦”。李梴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深谙《灵枢·营卫生会》的“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渫”及《难经·三十八难》的“有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有名无形，其经属手少阳”《难经·六十六难》：“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之经旨。另外，李梴将《难经》三焦“原气之别使”的功能进一步发挥称“约而言之，三焦亦一焦也。焦者，元也，一元之气而已矣”，认为全身脏腑之所以归属于三焦、本于三焦，全在于三焦主持元气之功，即所谓“焦者，元也，一元之气而已矣。”也正因为如此，脏腑间不仅存在着表里配合关系，而且各脏腑之间也有

在着互通关系,并引《五脏穿凿论》的“心与胆相通,肝与大肠相通,脾与小肠相通,肺与膀胱相通,肾与三焦相通,肾与命门相通,此合一之妙也”加以说明。

由于三焦、命门的特殊性,故李梴认为二者虽均非“正脏”“正腑”,但二者相合则成十二脏腑之数。正如其云“命门,即右肾,言寄者,命门非正脏,三焦非正腑也”“命合三焦”。虽然李梴将命门与三焦相配,但在应用上仅将“血衰面黄,而心下崩且烦”病理用此解释,且这里的命门用的又是心包络的概念。此外,在脏腑与脉位的配属上提出“肾合膀胱,左尺之脉纯乎水;命合三焦,右尺之脉纯乎火”,即将命门与三焦相和;在三焦功能与病变论述中,主要将下焦与肾、命门结合阐述,而中上二焦则较少涉及。因此可以说,虽然李梴在名义上将命门与三焦相合,但在具体运用上则阐发不多。

1.5 对“凡十一脏取决于胆”新解

“凡十一脏取决于胆”出于《素问·六节藏象论》,各医家对此的认识可谓百花齐放、仁智互见,李梴亦执一方,他主要从胆主火之游行、主荣卫之运行立论,以阐发胆对其他脏腑的作用。如其云:“脏腑之散殊如此,然岂无其要乎!经曰: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盖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居中,火独游行其间,以主荣卫而不息,火衰则为寒湿,火盛则为燥热,故曰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又云:“荣卫虽主于肺,而其流行则又主于胆也,故胆气始于子云。”这种认识可谓标新立异,较其他各家有很大不同。

总之,李梴作为一代名医,其《医学入门·脏腑》确实有许多可取之处,亦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为繁荣中医学学术做出了贡献。但是亦应看到,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下面仅提出一二。

2 有待商榷之处

2.1 论述过于简略而欠全面

名曰“入门”,当既体现医学之基础,又能较全面地反映中医学的内容,但“脏腑”一节中尤其是总论中重于脏与腑的总体区别而缺乏脏与腑之间的配合、互补之关系论述,缺乏脏腑与经脉联系这一重要内容;虽言其病传,但仅重疾病按五行格局传变,而对脏腑相近而病移,如《素问·气厥论》,却只字未提。“脏腑”之“条分”中,就脏腑与精神活动的关系而言,仅谈到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肾藏志,而对脾藏意及五脏主情志这一重要内容则缺如。另外,“脏腑”引用了大量的前人论述,如《素问》《灵枢》《难经》原文等,但其所引用时既未标明原文出处,引文又较简略且随意性较大而不规范,常易使人产生误解,难

以分清那些属古人论述,那些是他自己的发挥。

2.2 重解剖,以解剖形象释生理

李梴提出了人体之心有“血肉之心”与“神明之心”的区别,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在论心脏实体时却又说:上智聪明之人七窍三毛,“中智五窍三毛,下智三窍一毛,常人二窍无毛,愚人一窍,下愚一小窍,无窍则神无出入之门”。即把实体心脏与人的神志情况联系起来,欲用实体心脏状态解释人的神志活动,这又是将“血肉之心”与“神明之心”不分的表现。不仅如此,李梴在“脏腑”条分中将每个脏腑的解剖形象及实体重量均依《难经》为蓝本而一一记录在案,且每每用以解释各脏腑的功能,如其言:“肝有二布叶,一小叶,左三右四,其七叶,分两行,如木甲析之多叶也”,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共八叶,下无窍,叶中有二十四空,行列分布诸脏清浊之气”等等。可见,李梴是非常重视解剖的。

《内经》所建立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学术特征之一是从功能角度把握生命规律,之所以如此,有历史上的思想根源,也有医学本身原因。从历史上看,重功能观念几乎是整个中国古代的一种思维倾向。《易传·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孙星衍《周易集解》引崔憬解释说:“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言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道高于形,而道首先是“用”之道,功能的“道”比形质的“体”更加重要。从医学本身来看,由于当时生产水平低下,没有精密的实验设施,不可能从解剖结构形态详尽阐明人体功能活动的本质;另外应用解剖的方法研究人体的生理功能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唐宗海《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所言:“西医剖割视验,止知其形,不知其气,以所剖割,只能验死尸之形,安能见生人之气化哉!”所以《内经》便从人体体表的功能现象揭示内脏的功能活动规律,正所谓“以表知里”“司外揣内”。《内经》的各种理论,包括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均主要指功能而言,而形质则处于次要地位,并以此形成了中医学理论系的特点。若此,再重解剖形质并以为之据来说明、阐释功能,则或与已经建立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不甚吻合,或牵强附会,难以服人,如上引李梴所谈心之窍、毛与人智的关系等即属此。

2.3 结合儒家伦理道德释五脏

李梴强调学医者应读儒书,并建议把读儒书作为医者每日的必修课。他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云:“每早对先天图静坐,玩读《孝经》《论语》、

《小学》；大有资力者，次及全部《四书》、古《易》白文及《书经》：‘洪范’、‘无逸’、‘尧典’。盖医出于儒……”。应该说这种要求与认识有一定道理。但是他在论述脏腑功能时，却也结合儒家的内容，如“脏腑”中云：“肺在德为义，心为礼，肝为仁，脾为信，肾为智。”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道德之五种行为或德行，即所谓“五常”，也可以认为是儒家伦理学的五行运用，但已均有其特定的含义，与哲学及医学中的木、火、土、金、水有着本质的区别，与中医学中的五脏更是毫无联系。若此再把仁、义、礼、智、信同五脏结合论述，则不甚妥当。

2.4 有关脏腑数目之论

“脏腑”总论认为中医脏腑数目较为混乱，腑有五、六之说，脏六、九之分，而所谓九者即神脏五、形脏四，另外还有奇恒之府、魄门、头、背、膝、骨等，于是得出“脏腑之散殊如此”的结论。不过从其“条分”所述也可以看出，李杲最后把脏腑数目还是定为十二，除较为明确的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胆膀胱、胃之五脏五腑外，加上了非正脏与正腑的命门和三焦。

九脏一词见于《素问·三部九候论》及《素问·六节藏象论》，其云：“形脏四，神脏五，合为九脏以应之。”对“神脏”指心、肝、脾、肺、肾，医家无何争议；但对“形脏”则注家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从《素问·三部九候论》九脏应九野并通过三部九候法可以候之来看，形脏当指三部九候法所候的脏腑，即指头角、口齿、耳目、胸中。其含义王冰讲得较为清楚，即所谓“形分为脏故以名焉”，“所谓形脏者，皆如器外张，虚而不屈，含藏于物，故云形脏也”。举凡《内经》中的魄门、头、背、膝、骨等皆是形脏概念的运用。不过形脏属于区分脏腑、确定脏腑概念的早期产物，因其不完善和较为混乱，且把表现于外的器官、身形部分也定为脏腑，不符合“藏象”理论。因而这种认识并未受到中医学家的足够重视而逐渐被淘汰。奇恒之府虽是《素问·五脏别论》在运用“藏”、“泻”区分脏腑时提出的概念，但从其明确提出此为“奇恒”之性来看，即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脏腑，既然与脏腑有重大区别，故脏腑数目当然亦不计“奇恒之府”。就脏腑数目而言《素问·金匱真言论》明确提到“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且《内经》多处提及“五脏六腑”之说，显然这一理论在《内经》中是占主导地位，是较确定的，即所谓“十一脏腑说”。另外《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十二脏之相使”“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即在上述十一脏腑之外还有膻中。膻中，在《内经》中的含义不同《灵枢·胀论》云：“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指心包络，且《灵枢·经脉》论及十二经脉与脏腑相合时亦有心包络，故可知所谓“十二脏腑说”当指上述十一脏腑加上心包络以合十二经。由于《内经》认为心包络为心的附属，故论述脏腑功能时以十一脏腑说为主，而十二脏腑说则主要用于十二经脉说。因此可以说自《内经》始，中医脏腑数目就较为确定与清楚，并未如李杲所云“脏腑之散殊如此”。后世王好古《此事难知·问脏腑有几》认为六脏六腑之外加“胞”一腑，则为十三脏腑，但此胞的含义或可理解为尿胞而属膀胱之一部分，或亦可理解为心包络而早已存在于六脏六腑之中，故而十三脏腑说不能成立。至于《难经·三十九难》提出“五脏亦有六脏者，谓肾有两脏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这里《难经》为了解释脏有六的说法而提出了命门亦是一脏，不过它还是坚持正式的脏只有五的说法，正如《难经·三十八难》所云：“脏唯有五。”另外，从《难经·三十九难》所述的“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来看，这里所称的命门功能实为肾脏功能的一部分，故可以说《难经》的说法仍是《内经》十一脏腑说的延续。李杲发挥了《难经》的某些观点，将命门列为独立的一脏且与三焦相配，我们认为是丰富与繁荣了命门学说的内容，但对于其合理性与运用价值，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焉”，即在上述十一脏腑之外还有膻中。膻中，在《内经》中的含义不同《灵枢·胀论》云：“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指心包络，且《灵枢·经脉》论及十二经脉与脏腑相合时亦有心包络，故可知所谓“十二脏腑说”当指上述十一脏腑加上心包络以合十二经。由于《内经》认为心包络为心的附属，故论述脏腑功能时以十一脏腑说为主，而十二脏腑说则主要用于十二经脉说。因此可以说自《内经》始，中医脏腑数目就较为确定与清楚，并未如李杲所云“脏腑之散殊如此”。后世王好古《此事难知·问脏腑有几》认为六脏六腑之外加“胞”一腑，则为十三脏腑，但此胞的含义或可理解为尿胞而属膀胱之一部分，或亦可理解为心包络而早已存在于六脏六腑之中，故而十三脏腑说不能成立。至于《难经·三十九难》提出“五脏亦有六脏者，谓肾有两脏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这里《难经》为了解释脏有六的说法而提出了命门亦是一脏，不过它还是坚持正式的脏只有五的说法，正如《难经·三十八难》所云：“脏唯有五。”另外，从《难经·三十九难》所述的“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来看，这里所称的命门功能实为肾脏功能的一部分，故可以说《难经》的说法仍是《内经》十一脏腑说的延续。李杲发挥了《难经》的某些观点，将命门列为独立的一脏且与三焦相配，我们认为是丰富与繁荣了命门学说的内容，但对于其合理性与运用价值，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2.5 某些理解值得探讨

“脏腑”中的一些理解，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今举几例如下。

2.5.1 心主血推动气血运行

“脏腑”云：“心之系与五脏之系相连，输其血气。”又云：“人身动则血行于诸经，静则血藏于肝脏，故肝为血海，心乃内运行之，是心主血也。”将心主血指为心具有推动气血运行之功。《内经》认为血的运行依赖气的推动，而此气主要是宗气，正如《灵枢·邪客》所云：“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即便是西医学明确认为的左乳下心尖处的搏动《内经》也认为是宗气所为，如《素问·平人氣象论》所说：“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甲乙经》作手），脉宗气也。”“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而宗气则是肺之清气与胃之水谷精微结合而成，其中肺为脏主气，故于推动气血运行方面更为重要，而有“五脏六腑之所终始”（《难经·一难》），“肺朝百脉”（《素问·经脉别论》）之称，即

凡言气血运行则以肺为首要而不及心。至于《内经》所称心主血脉,其义有二:一者心主血,言心主宰血液的生成;一者心主脉,言心主宰全身脏腑、组织之间的联系通道,《素问·灵兰秘典论》将之称为“使道”,王冰注曰:“神气相使之道。”关于血液的生成,其物质基础是水谷精微等,即所谓“中焦受气取汁”(《灵枢·决气》),尚依赖肺的参与,如“注于肺脉”(《灵枢·营卫生会》),但其之所以成为红色,则是受心火气化的结果。故《素问·经脉别论》说:“水谷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灵枢·营卫生会》说:“血者,神气也。”所以张志聪《灵枢集注》云:“血者,中焦之精汁,奉心神而化赤,神气之所化也。”可见,心主血则主要在于阐明心参与血液生成之用,而推动气血运行中医学则主要责之于宗气,究于肺。李梴解心主血为推动气血运行,当是重解剖、从脏器实体研究的反映。

2.5.2 肝为宰相,肺为尚书

“脏腑”言:“肝藏魂,魂者,神明之辅弼,故又曰肝为宰相。”“肾纳气,肺主气,肺主行荣卫,为相傅之官,治节出焉,为气之本也。相傅,如今之尚书。”将脏腑用朝廷官职来比拟,主要见于《素问·灵兰秘典论》,就肺肝二脏而言,其云:“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相傅,古代官名,如相国、宰相、太傅、少傅等,辅助君主而治国者。肺位高近君,主气调营卫而治节出焉,故犹之相傅之职。肝,敦煌医书残卷《明堂五脏论》曰:“肝者,干也。”《尔雅·释言》云:“干,扞也,即相卫也。”亦言肝在生理上具有保护人体的作用,故称之为“将军”。举凡肝主疏泄,性喜条达,藏血调血以适应人体需要,主谋虑参与决断等均说明了这一点。故可以说,《内经》将肝比拟为将军、将肺比拟为宰相一类,是从各脏腑功能作用及重要程度出发而论,较符合实际而实用,对中医学影响甚大而成为中医学的重要观点之一。李梴“脏腑”则从“肝藏魂”出发,指肝为宰相,仅强调肝的某一种功能特点,较之《内经》片面而失全面;指肺之“相傅”为“如今之尚书”,则属对心肺关系的理解较为偏颇。

2.5.3 脾为谏议

“脏腑”云:“脾本仓廩之官,五味出焉。饮食人之大欲,凡生冷坚硬之物,心所欲食而脾不能化则不敢食,故又名谏议大夫。误食者,留而伤质,甚于伤气也。”脾为仓廩之官,出自《素问·灵兰秘典论》及《素问·六节藏象论》等,言脾为气血化源之义。脾名谏议出自于《素问·本病论》,其云“脾为谏议之官,智

周出焉”,此言脾主意主思,是人体认知、思维、意志及情感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维及情感过程的重要基础,是心主神明的前提。脾为“谏议”,是说脾藏意意思有协助心君决定意志的作用,故才能达到“智周出焉”。若此,再看“脏腑”所云,仅从脾主“饮食”作解,不仅义狭且与经旨难符。

2.5.4 以五行间的关系释五声

“脏腑”本《难经》提出了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声、肾主液,并以五行特性阐释了各自的道理,较有新意,但对五脏各自所主之声,亦从五行间相互关系作解。如其云:“肺主声应秋,金之有声也,五声皆肺所发,自入为悲即哭也,金气肃杀凄惨,入肝为呼金胜肝,故发为呼,入心为言火克金,故述为言,入脾为歌母见子则乐而歌,入肾为呻子见母则娇而呻吟。”(此处引文小字为李梴所作之注文)。古人运用五行归类各项事物,把人及动物外发之声音归纳为五声而分属五行五脏。单言声音,由于五脏之中,肺为金,金不静则鸣,肺主喉,喉主声,故声由肺所主。但具体分析各种声,则又可分属五行、五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肝“在声为呼”、心“在声为笑”、脾“在声为歌”、肺“在声为哭”、肾“在声为呻”,而这里的五声皆与各自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有关。肝在志为怒,怒为郁所致,郁发则势猛,故怒发于外表现在声上则为呼;心在志为喜,喜为愉悦之情,表现于外则为笑;脾藏意在志为思,张介宾注云“得意则歌,脾之声”;肺在志为悲,故在声为哭;肾在志为恐,恐为惧怕未来而痛苦之志,呻吟亦为痛苦之声,故肾声为呻吟。此外《难经·三十四难》言心“其声言”而没有“笑”,其实这正是从心藏神、开窍于舌,而言语又是人思维、意志、情感等表现于外的这一窗口来考虑的。可见,概括而言,声可以总统于肺金,但又根据其不同表现而分属各个脏腑,李梴“脏腑”仅从五行与肺金关系立论分析,未考虑声的不同表现与各脏腑生理病理之关系,故较为牵强,难以服人。

综上,李梴之《医学入门》在中医学中是一部重要的医学著作,尤其是其“脏腑”部分,有其特色,为中医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应看到,其论终究是一家之言,理解前人观点亦有偏颇不足之处,故应当辩证地看待之,切不可一味继承与依赖。另外,李梴“脏腑”所本仍是《内经》《难经》等古籍,故欲真正学习好中医学、掌握中医学,还是应该深究《内经》《难经》等原著。若此,也才能少走弯路,深刻领会中医学之真谛。

(收稿日期:2000-11-21)